

世界经济

试析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宋国友

[摘要]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大议题。中国、美国和欧盟三者构成其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在货币体系、金融体系以及汇率体系这三个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子领域中,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利益聚合、互动方式和政策诉求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虽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力量有了显著增加,但把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金融影响力还需要一段时间。

[关键词] 三边关系;货币体系;金融体系;汇率体系

[中图分类号] D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4-0060-65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议题,而中国、美国和欧洲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三大行为者。这不仅是因为此三者的经济总量及其所具备的全球影响力,更是因为它们通常在若干重大金融议题上并不存在一致的利益并由此引发了巨大的政策差异乃至冲突。正是这种差异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进行研究。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其实包括有多个向度的子领域,货币体系、金融体系以及汇率体系这三个子领域是最为重要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在这三个不同的子领域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只有深入探寻在这些不同子领域的三边关系,才可能更好地把握整体上的三边金融关系发展脉络,并因此更好地分析未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变方向。

一、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的简要回顾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与西方经济体系隔绝,并不存在中美欧三方在金融领域的三边关系。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相继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之后,三方才在金融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1]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三边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边关系,而是美欧双边关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在

其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种状况不仅在三边金融关系中如此,就是在中美、中欧这两个双边金融关系中也是如此。在上述两个双边金融关系中,中国处于毫无疑问的弱势和被动地位。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对于美欧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规则尚处于学习和适应过程当中,另一方面,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此一阶段的经济实力以及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相较于美欧明显处于劣势,没有能力在货币金融领域影响双边关系。美欧金融关系仍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居主导地位,中国对其是单方面的依赖。在这一阶段,美欧双边关系,而非中美欧三边关系,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无法有效参与,更不用说塑造当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大事件了。广场协议的达成,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欧元的诞生以及美欧在这一领域的博弈,还有东亚金融危机等数次地区性金融危机构成当时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要议题。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出现了逐渐成形的趋势。促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根据名义GDP来衡量,中国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强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2]根据国际贸易额来衡量,中国现在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对外贸易总额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将超过美国;从外汇储备来看,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惊人,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世界

第一的外汇储备拥有国。^[3]

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提升中国的影响力,进而改变原先那种只由美欧双方塑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格局。不过,虽然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相比前一阶段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在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中仍然无法居于核心和对等的位置。毕竟无论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还是从货币的影响力,以及国际组织的制度惯性等方面来看,美国和欧洲依然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决定性行为者。中国在诸多重要的国际金融议题中,还仅仅处于活跃参与者的角色。此外,三边金融关系也仅仅是逐渐成形,很难说真正形成。美国和欧洲除了一些确实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或者IMF份额调整,其他重大议题的通常处理模式或者由美欧单边决定,或者双边沟通协调。

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真正促成了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的出现。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在美国,并且迅速蔓延至全球,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被深深卷入其中,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要尽早走出危机,仅仅有美欧之间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传统协调是远远不够的。如要进行有效的政策应对,必须有广泛国际参与的政策合作。美国和欧洲都已经意识到此点。新兴经济体因此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幅提高,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发言权也大为增强,而中国无疑是新兴经济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非但如此,这场危机所产生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原有国际金融体系存有若干重大缺陷,其中包括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不力和国际金融组织代表性不够等问题。要防止类似金融危机的再次出现,弥补金融体系的制度缺陷以及进行相应的改革就刻不容缓。而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拥有不容忽视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是各方都已经认识到的国际政治现实。至此,金融危机改变了三边金融关系的互动图景,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名副其实。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已经形成,但严格来说,这还不是一个力量对称、影响力平衡的三边关系。美国依然最具影响和实力,欧洲居次,中国位列最后。美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确实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中,仍然是力量最强的主导行为体,无论欧洲还是中国,很难说能够对其主导地位形成真正挑战;欧洲不仅没有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缩小与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实力差距,反而遭受这场危机的较大冲击,

暴露了其在区域金融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固有软肋,无法扩大世界对欧元的信心;中国应对危机的表现可圈可点,并且也尝试着推动人民币在结算货币以及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地区化和国际化,但毕竟起步较晚且受到较为严重的制度限制,要想获得足够的国际金融地位,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二、中美欧国际货币体系的三边关系

简单地说,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以前,三边货币关系的特点是美元无论从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或是投资货币角度衡量,都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欧元不能够对美元形成真正全球挑战,更多的只是一种地区性的货币。受希腊等地区内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冲击,其世界地位甚至更加不稳固。中国人民币仅仅限于国内使用,无法对美元或者欧元产生实质影响。

二战后美元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事实上充当了世界基准货币的角色。^[4]这种基准货币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作为一种结算货币,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占据了86%的份额。^[5]在国际贸易中,美元也是最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21世纪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当中的比例在63%左右甚至以上。除了欧元区的周边地区之外,世界主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也主要和美元挂钩。

尽管欧洲的经济总量大于美国,欧元自出现以来确实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迄今为止欧元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竞争过美元。与美元相比,欧元的发展有如下几点弱势:①有限的经济增长前景。欧盟的经济总量略强于美国,但其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总量将会被美国赶上;②缺乏统一的金融体系,各国金融体系未能深度融合。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三足鼎立,都是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却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③欧洲经济整合尚欠火候,无法形成真正的整个区域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机制;④不仅欧洲自身,其他国家在安全领域也大大需要美国。^[6]

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经济步入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政府大举借债,形成屡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以及负债。^[7]如此的债务负担将使美国经济的未来竞争力和美国政府的债务偿付能力遭受质疑,这直接影响着基于信心基础的美元国际地位。^[8]此外,金融危机的爆发还促使世人反思把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风险

性。逻辑很简单,一方面,危机肇始于美国,美元由美联储发行而流通于全世界。源于美国的危机会迅速传导到其他地方,从而带来巨大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借助受其控制的美元来转移危机应对成本,让其他国家共同承担。

正是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潜在危害,无论是欧洲或者是中国都对美元颇有微辞。欧洲的代表是法国。法国总统萨科奇曾公开明确表示他将寻求创造一个不再仅仅围绕美元的新国际货币体系。^[6]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直指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弊端。^[10]

如果在欧洲和中国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选择放弃美元转而支持欧元,那么美元的国际地位很可能会遭受致命的打击。然而,尽管中国期待欧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认为事实会如此。最近欧元区不少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给欧元的前景蒙上了不小的阴影。同样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外汇资产组合,中国政府即使有意增加欧元储备和适度减少美元储备,也不希望美元国际地位过度受损。这主要是因为美元在现阶段丧失国际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据统计,中国当前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在 1.5 万亿美元左右。美元丧失国际地位意味着其将会大幅贬值,并因此导致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面临巨额损失。这显然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11]

中国也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推动人民币地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这不仅是防范美元或者欧元风险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对本国货币提出的必然要求。人民币地区化和国际化的具体政策主要表现在人民币的储备功能和结算功能两方面。在储备功能上,中国央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与 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 6500 亿元人民币。在结算功能上,中国政府从 2009 年初开始在国内部分地区与香港、澳门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试行人民币结算。尽管人民币初试身手,但在现阶段其对欧元和美元都不构成实际挑战。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仍处于初始的阶段,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尚不具备和欧元以及美元竞争的實力。另一方面,人民币目前仍不可兑换,资本项目没有开放,这极大地约束了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12]

相比于金融危机以前,金融危机之后中美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互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美国而

言,要继续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不允许有其他货币能对其形成真正挑战,其主要关注对象是欧元,而不是人民币;欧洲的利益是进一步推进欧元在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使用,提高其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并不满意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会继续推进,但在短期内无法对欧元以及美元现有的地位产生真正的实质影响。美欧关系仍是三边货币关系中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但中国力量上升的趋势明显。中国在现阶段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直接挑战,而是其在理论上可以凭借其巨额外汇储备和经济实力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平衡角色,来改变美欧两方在货币体系中的相对力量。不过,考虑到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的事实,中国在政策选择上不得不偏好美元,这形成了天然的中美货币同盟,使得欧元处于不利地位。

三、中美欧国际金融体系的三边关系

和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着眼于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不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国际金融组织,比如 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等。此外,各国中央银行、金融业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活动的各大私人金融机构也包括在内。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中美欧三边关系最为集中地体现在 IMF 的改革上。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IMF 的改革已经被广泛讨论,并对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一定的共识。^[13]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凸现了 IMF 改革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作为被赋予监管国际金融体系重大责任的 IMF,它既不能就本次危机的爆发发布及时准确的预警,也不能在应对危机的初期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资源,从而客观上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全球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 IMF 的呼声愈发强烈。所以,问题不是改或者不改,而是如何改。

美国和欧洲从自身在 IMF 已经既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出发,希望采取的是强化 IMF 的政策改革路径。问题在于,在是否强化 IMF 作为全球金融体系更有力的监管者方面,美欧必须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支持。为此,美欧借助各种重要场合,特别是 G20 峰会来实现此政策诉求。在美欧的大力推动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现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在迄今为止的三次 G20 峰会中得到了确认。

中国同意加强 IMF 的作用当然是有合理条件的,

即必须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 IMF 中的代表性。所以, 与支持 IMF 同时推动的, 还有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对更多话语权的追求, 特别是在 IMF 中的份额提高。增加了中国等国家的 IMF 份额, 就必然意味着某些国家在其中份额的减少, 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在当前的 IMF 份额中, 美国和欧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按照 IMF 的统计, 美国的份额为 17.1%, 欧洲国家的份额累计为 32.4%, 而中国只有 3.7%。^[14] 如果说按照 GDP 的规模来衡量, 美国在 IMF 中的份额比重尚可谓大致相等的话, 那么欧洲在 IMF 中的份额要大大超过其 GDP 的比重, 明显缺乏合理性。而中国的 IMF 份额要显著低于其 GDP, 严重不合理。所以在逻辑上, IMF 改革确实也要降低美国和欧洲的份额, 提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这就涉及了 IMF 改革的核心问题——份额改革问题。

作为既得利益者, 美欧并不情愿放弃这种份额方面的优势。虽然不情愿, 但中国已经和其他重要新兴经济体联合起来, 就 IMF 份额改革问题表达了态度非常鲜明的立场。在 2009 年 9 月举行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与会国家提出“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对于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和平衡发展至关重要。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言, 影响两机构合理性的问题主要是份额和股份的不公平分配。”^[15]

在此情况下, 让渡部分份额是美欧必需的选择。对美国而言, 由于根据现有 IMF 议事规则, 重大事项必须有 85% 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 所以美国必须至少要保有 15% 以上的份额才可以继续维持它的一票否决地位。这意味着它的份额放弃幅度十分有限, 因此美国试图施压让欧洲来承受份额的减少。在 G20 匹兹堡峰会召开前, 美国政府曾提出过两个改革 IMF 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一, 从发达国家转移 5% 的份额到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第二, 把现有 IMF 董事会的 24 席缩减至 2012 年的 20 席。无论是上述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都会损害欧洲的利益。^[16] 为了取得欧洲在份额上的让步, 美国认可欧洲提出的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的倡议。

根据计划, IMF 份额新一轮改革的结果在 2011 年 1 月之前应该会水落石出。若不出意外, 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份额将会在此次调整中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虽然这样的调整无法根本上挑战美国的 15% 否决权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 IMF 中的最大份额, 但这是一个趋势, 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中国

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机制化的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一轮份额调整中, 虽然单凭中国一国仍然无法调整美国和欧盟的否决地位, 但是如果“金砖四国”在份额调整之后的总体份额若能由当前的 9.8% 上升至 15% 以上, 并且可以形成某种程度的“份额联盟”, 那么将会改变目前 IMF 中只有美国和欧盟才可以对重大事项具有否决权的现状, 从而改善中国在中美欧三边在 IMF 中的地位。

四、中美欧汇率体系中的三边关系

汇率体系中的三边关系是指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各自的汇率政策及其之间的汇率关系。严格来说, 它应该属于货币体系的一个组成领域。但考虑到它的重要性以及议题的相对独立性, 可以把它列为一种单独金融关系。

在三边汇率关系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人民币汇率问题。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其对美出口连年迅速增长, 对美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 受此影响, 美国国内对中国政府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指责开始不断出现, 认为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汇率是导致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出现的关键原因之一, 因此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经过慎重权衡, 中国政府不仅决定在 2005 年 7 月 21 日让人民币升值 2%, 而且以此为起点, 开始了人民币缓慢的升值过程。问题在于,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并不让美国满意, 美国国内继续把其对华贸易逆差视为过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 希望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为此, 美国政府此后仍不时采取多边、双边和单边的各种措施来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

与美国对华的巨大压力不同, 欧洲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加入共同施压的阵营。这是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经贸摩擦是中美摩擦而非中欧摩擦。直到 2007 年, 中国对欧盟出口才超过对美出口。^[17] 但随着中国对欧出口的逐年增加以及对欧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 欧盟也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提出要求。可以观察到的是, 在 2006 年举行的中欧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上, 人民币汇率尚不构成重要议题, 但在 2007 年, 欧洲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以及人民币汇率本身的关切便急剧上升。造成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在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变化。该年, 人民币对美元、港币、英镑和日元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 升幅分别为 6.83%、7.07%、5.01% 和 2.37%。然而, 人民币对欧元却有贬值, 贬幅为

2.85%。在2007年11月份,由于美元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对欧元贬值一度接近7%。^[18]

在欧盟看来,其对中国贸易逆差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制定了事实上的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由于当时美元对欧元大幅贬值,变相使得人民币对欧元也大幅贬值。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在阻碍了欧盟产品对华出口的同时,还增加了中国产品对欧盟的出口,导致欧盟对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曾在2008年年初表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得到了提高,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民币对欧元出现了贬值。对此,我们希望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能进一步加大,要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19]这是欧盟高层在人民币汇率上发出的清晰信号,希望人民币对欧元和美元能够一视同仁,放弃只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贬值的策略。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欧不仅通过双边机制分别对中国施加影响,而且联合起来,希望集两家之力共同采取措施来塑造人民币政策。G7是美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的主要平台。自2007年之后,美欧在人民币问题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态度,即要求中国政府加速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使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2007年2月10日在德国埃森落幕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公报中,甚至公开点名中国,表示“对于那些有着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帐户盈余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来说,我们希望其有效汇率加大波动,以促成必要的调整。”^[20]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的重点在于应对危机,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欧的对外经济议程中不具备以往那种议题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在此过程中美国特别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中国担心人民币继续升值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因此坚决反对在人民币汇率上做出让步,所以美国和欧洲在金融危机期间并没有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对华政策重点。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汇率问题在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新增加。首先,经济复苏前景总体看好,美欧对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需求开始下降,因此可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敲打中国。其次,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诸多原因中,美欧很多专家认定中国政府的人民币政策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人民币汇率过低确保了出口的优势,进而造成相关国家贸易逆差增加,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出现。所以,要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避免未来类

似危机的爆发,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应该要调整。最后,美国政府出台的若干经济刺激方案尽管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因此,美国政府力图通过推动本国产品出口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在政策逻辑上就希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面临美欧更加大的压力。事实上,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重拾施压态势。美国国会也提出了严厉的人民币汇率议案。与反补贴和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相比,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显得一劳永逸。只有在这种人民币升值、美元相对贬值的汇率变化下,美国产品才会有机会更为容易和更多地出口到中国。所以,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将会长期存在。

中美欧三边在汇率问题上,人民币汇率问题贯穿始终。在该领域的三边关系中,美欧构成较为一致的利益和政策结盟,中国是被施压的第三方,处于被动和防御的位置,美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行合作,期待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产生有实质效果的影响。中国从实际情况和自身利益出发,在该问题上不会轻易妥协,还会和欧美两方进行长时间的博弈。

五、结论

以差异和冲突为显著特征的三边金融关系并不是固化的,而往往以变化着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可能引发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议题的变化最为关键。三边金融关系的利益聚合、联盟对抗、表现形式和互动方式明显随着议题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

在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的主要领域中,美欧仍然是其中的主导者,此两者的利益、立场和政策能够更多地塑造某一金融议题的走向。而在美欧双边金融关系中,美国又比欧洲更为强势。这是因为无论是从货币影响力,还是综合实力来看,美国都要超过欧洲。美欧两国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正常情况下这些矛盾能够在一定的机制下得到协商和解决。

金融危机的出现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相对实力确实在迅速上升,影响力也在迅速扩大,甚至在某些领域能够维护自身利益,抵制欧美的压力和诉求。但客观地说,无论是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中国在国际金融三边关系中并不是对等的一员。即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美欧差距越来越缩小,但在国际金融体系自身运作——国际机制由美欧掌握——的制度惯性之下,中国政府把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金

融影响力还需要一段时间。

与中欧金融关系相比,中国和美国的金融关系要更为密切,利益也更为攸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和美国而非欧洲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经贸联系。美国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曾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至今仍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密切的贸易关系引发了密切的金融关系。另外,在欧元出现以前,中国的人民币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与美元挂钩。这种情形延续至今日,进一步产生了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金融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的下降,以及欧盟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的增加,货币跟着贸易走,中国和欧盟的金融关系会比以前更为重要。

[注释]

- [1] 关于此一阶段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过程,可参见 Harold Karan Jacobson,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 [2] 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按照汇率来排名,中国的GDP也很可能在2010年超过日本。
- [3] 截止200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参见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20&id=5。
- [4] Eric Helleiner,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What Future for the US Doll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5, No. 3, 2008, pp. 354-378.
- [5]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Foreign Exchange and Derivative Market Activity*, Basel: BIS, 2007, p. 50.
- [6] Jean Pisani Ferry, Adam Posen, *The Euro at Ten: The Next Global Currency?*,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pp. 6-7.
- [7] 2010年2月份,美国国会不得不依照美国财政部的建议,把国家债务总额上限由此前的12.4万亿美元提升至14.3万亿美元,几乎和美国一年的GDP相当。参见 <http://www.nytimes.com/2010/02/05/us/politics/05debt.html>。

- [8] David Walker, *Comeback America: Turning the Country around and Restoring Fis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p. 13.
- [9] John Vinocur, "Making Sense of Sarkozy's Currency Proposal", *The New York Times* [N], Dec 14, 2009.
- [10]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9年第7期,第8页。
- [11] Daniel W. Drezner, "Bad Debts Daniel: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9, pp. 7-45.
- [12] 高海虹,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和条件》[J],《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59-60页。
- [13] Edwin M. Truman, *Ref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 Century* [M],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 [14] "Reform of IMF Quotas and Voice: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exr/ib/2007/041307.htm>.
- [15] 《“金砖四国”呼吁重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分配》,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9992643.html>。
- [16] Bob Davis, "Washington Aims to Shuffle IMF Sea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3, 2009.
- [17]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6年中国对欧出口为1819亿美元,对美出口为2035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欧出口为2452亿美元,对美出口为2327亿美元。2007年,欧盟27国中,仅仅只有奥地利、马耳他和荷兰对华有贸易顺差,其他24国均为逆差。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为982亿美元。2006年贸易数据可参见 <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702/20070204346971.html>; 2007年贸易数据可参见 <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802/20080205374215.html>。
- [18] 丁志杰:《2008年人民币汇率展望》[J],《金融与经济》2008年第1期,第9页。
- [19] 林铁钢:《访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中国金融》2008年第1期,第22页。
- [20] "Statement of 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http://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hp350.html>。

作者简介: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0-03-21

修改日期:2010-05-21

This application will enhance Japan's statu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olitics. China's maritime strategic operation space will be seriously squeezed. Preservation of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will face a more complex situation.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similar concern on this matter and make clear our position. Meanwhile, we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time to explore these waters, and gradually make full use of this water.

Theoretical Probes

55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rying from Material First to Concept First *by Hua Xiang*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ositivism thought and mod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 in the whole Western thinking, which constitute the intellectual basis of empirical methods in IR. On the premise of Positivism's own logic and by reviewing the clues of positivism thinking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sciences, we find that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ly provides "demonstration" approaches, and cannot guarantee the objectivity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shares an equal import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demonstration, all of which will find their plac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objects and different scopes.

World Economy

60 China, the U. S. and the EU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by Song Guoyou*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ignific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ctors. However, the interest convergence, method of interaction and policy focus among these three actors differ in the monetary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and exchange rate system. China still needs more time to transform its economic power into financial influence worldwide.

Countries and Regions

66 Another Comment on the "Haider Phenomenon" *by Zhang Li*

Since 1986, Haider has fully taken hold of the highest leadership power of the Freedom Part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aider phenomenon". The "Haider phenomenon" has three key features: political protests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parties, the right-wing populist mobilization strategy and Austrian nationalism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pasting of the "Haider phenomen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 of Austria, the workings of complex history and vague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also fostered by the right-wing populist forces in Western Europe.

73 Analysis of the Chakma-Hajong Issu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by Li Jinke & Ma Dewen

Between 1964 and 1969, the Indian government settled 2748 Chakma-Hajong families i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This action cau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both on the migrants and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idespread anti-migration campaigns against the Chakmas and Hajongs broke out. Today the local people still strongly insist that Chakmas and Hajongs should leave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This unresolved issue is a main factor which may affect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area for the coming years.